

中国 文化现场

张英



著

ZHONGGUO
WENHUA XIANCHANG

南方周末记者文集
在这里，读懂中国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南方周末 记者文集

中国 文化现场

张英

ZHONGGUO
WENHUA XIANCHANG

著

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文化现场/张英著.——北京: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,2011.1

(《南方周末》记者文集:在这里,读懂中国)

ISBN 978-7-5639-2590-2

I. ①中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新闻报道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43161号

中国文化现场

张英 著

出版统筹 张 明

责任编辑 石莎莎

特邀编辑 王元涛

出版发行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100124)

010-67391722(传真) bgdcbs@sina.com

出 版 人 郝 勇

经销单位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72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17.25

字 数 270千字

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639-2590-2

定 价 26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-67391106)

《南方周末》记者文集 编辑委员会

总策划

王更辉 黄 灿 向 熹

主 编

陈明洋

编辑委员会成员

王更辉	黄 灿	向 熹	陈明洋
毛 哲	伍小峰	向 阳	郭光东
邓 科	朱 强	吴志泉	张 英

执行主编

张 英

你必须抚摸他们，他们是中国跳脱的心

我一直说，来《南方周末》的人，多少有点别有抱负。这些人，往大里说，胸怀理想，心忧天下，距稻粱之谋远，离家国情怀近，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；往小里说，他们不过是说点真话，说点实话，不过是我手写我见，我口说我心，不过是在新闻这样一个岗位上，在中国特色的巨大转型中，尽一点新闻人应尽的职分而已。套用维特根斯坦对人最高评价的话“他还像个人”来说，就是：他们还像个新闻人。

我说过，真话在中国曾是——现在也许还是——稀缺的产出。“有可以不说的真话，但是绝不说假话”，在新闻共同体中大约遂成名句，原出自南方老报人黄文俞之口，被左方、江艺平等一代代《南方周末》掌门人以及《南方周末》人视为报训，接力传递，铭之于心，应之于手，《南方周末》一纸风行到现在已是第二十六个年头了，应该说，良有以也。坚守这一报训，不容易，需要一点执著，一点坚韧，甚至一点——照北京话说——浑不吝，当然，也需要一点技术含量。

我也一直说，《南方周末》和《南方周末》人，其关系是彼此成全的。《南方周末》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界一个不算低的平台，《南方周末》人则高人辈出（据说，有《南方周末》是“中国新闻界的黄埔军校”之说。幸耶？非耶？）。“不算低”滋养“高人”，“高人”成就“不算低”，彼此遭遇，相得益彰。

并非蝉，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借秋风”。成全《南方周末》、滋养《南方周末》人的，是中国这个被视做新闻的天堂——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。新闻天堂，意味着不时有“同胞”地狱准地狱，而“物”不吾与也；是“要识中国真面目”的巨大挑战和巨大诱惑——中国仍未走出李鸿章所说的“三千余年一大变局”……

而被成全被滋养的《南方周末》佼佼者，“高人”中的“高人”，就是《南方周末》的高级评论员、高级记者、高级编辑吧。

这里的“高级”，是《南方周末》内部职称的塔尖；这里的内部职称，只能算是“内部粮票”，跟“省票”、“国票”不同，行用于《南方周末》内部而已。“职称”虽“内部”，标识的也是职业段位；高级，则有标杆之义；标准，自是“《南方周末》牌”的。

六年前，我忝为《南方周末》内部职称的始作俑者，是期望为无意于管理岗位的采编人员打通一条业务上升通道的，乃至有为《南方周末》服务的终身评论员、终身记者、终身编辑，而进入管理岗位的则不在职称评聘之列；六年下来，《南方周末》的“高级”计有十二位：

高级评论员：鄢烈山、陈敏。

高级记者：郭国松、南香红、李海鹏、张立、章敬平、陈涛、庞瑞锋、张英。

高级编辑：朱力远、林楚方。

如果不出意外，今年产生的高级职称者还有：马莉、刘小磊、袁蕾。前此“高级”而离开《南方周末》——前面说过“高人辈出”，这里是另一种“辈出”，即出去了——的，是八位：郭国松、南香红、李海鹏、张立、陈涛、庞瑞锋、林楚方、章敬平；留在《南方周末》的，还有四位：鄢烈山、陈敏、朱力远、张英，其为《南方周末》而“终身”乎？其为新闻而“终身”乎？

写到这里，要借李叔同一用，“悲欣交集”，不为矫情！悲不说了——《南方周末》或不止《南方周末》一机构之小悲而已，这里要说的“欣”是：无论“终身”的，还是“辈出”的，他们仍以《南方周末》为荣，他们仍以《南方周末》为家，为娘家，为冤家，为情人，可资证明的是：当《南方周末》要出这套高级丛书时，他们慨然允诺，把在《南方周末》的作品结集。

我不敢妄说我认为“《南方周末》关切‘中国根目录问题’”而他们是优异的身体力行者，我不想数说这些“‘高人’中的‘高人’”一个个地如何如何，我不能分说新闻如何易碎而南香红、李海鹏如何有“对抗时间的写作”，我也不再说杂文如何被鲁迅期待速朽而写评论的鄢烈山、陈敏又三复斯言：因为他们自有作品在，而读者诸君，你们亦自有目光如炬在！

是为序。

陈明洋 2010年4月18日于陈留居

在路上

我想做一个伟大的记者。直到现在，我才确定记者是我的终身职业目标。

作为记者，我的名字是2002年12月5日在《南方周末》上出现的。那篇稿子是《大陆运台文物都有一个“故”字头》，采访的是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诚如。带我进《南方周末》的是向阳，我被视为有一定经验的记者进了文化部。《南方周末》的门槛高，我和所有进《南方周末》的同事一样，从零开始干起。

开始我和所有的进入《南方周末》的记者一样，不习惯。《南方周末》没有职业培训，也没有采编手册。在北京的记者站，实行的是完全松散型管理，每周去一次记者站，开评报会报选题。从报选题到采访、写稿，完全是记者自己联系、安排。习惯了被管理的我，突然到这样一个放羊式管理的报社，非常的不习惯。好在过了两个月左右，我就进入了工作状态。

我接下来写的是4个版的专题：为2003年春节推出特刊“金庸影视”专题，从《射雕英雄传》开始，到正在拍摄中的《天龙八部》，我采访了张纪中、鞠觉亮、李亚鹏、周迅、周杰、胡军、周晓文等人。不久，因为关于北京永定门的报道《北京开门》，我通过了《南方周末》的试用期，正式成为《南方周末》的记者。

翻阅 2003 年的报道,《冯小刚:我要拍艺术片了》、《戴思杰和小裁缝》、《王志文这人》、《金庸:学问不够是我的一大缺陷》以及《金庸的节日》、《崔健:因为恐惧,所以批判》、刘震云专访等这一系列文章算可以留在我的书籍里。那一年是摸索期,但我没有让《南方周末》的编辑失望,通过这些独家专访,慢慢我知道《南方周末》的新闻应该怎么做。

之前,我在各家报纸干,无非是凭着年轻,身体好,勤奋刻苦,能写会跑,拥有一定的资源。任何有野心的年轻人都可在他的单位脱颖而出,成为佼佼者。但是,很快,你会发现,做一个勤奋的蚂蚁,是没有出息的,你得按照体制内的潜规则,先是成为编辑,再当副主任—主任—编委—副主编—主编,那是一个被所有人认可的价值和道路。在这样的环境里,很多才华横溢的年轻记者,大部分人在几年后变成一个平庸的部门主任,想方设法往上爬,成为管理团队和既得利益者队伍里的一部分。没有人把职业记者当成终身职业,也没有这样的价值观。

只有《南方周末》,给了记者激情、理想和信念。到了 2004 年,我已经成为本年度发稿最多的记者。葛优、徐克、几米、沙拉·布莱曼、周迅、吴倩莲、赵宝刚、周星驰、德波顿、杨争光、贾平凹的专访,世界遗产大会专题,余秋雨专访及余秋雨文革调查应该算是那一年让《南方周末》自豪的报道。

因为文化新闻只在局部有影响,到了 2005 年,我开始调整,由电视、电影、娱乐、文学扩展到教育新闻,陈丹青离开清华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,我独家抓住了这个机会,让他谈了大学艺术教育制度对艺术的危害。

在 2006 年,我开始放弃当作家的念头。《南方周末》文化部有数位高手,王寅是诗人、摄影家;夏榆是小说家、散文家;李宏宇是翻译家、影评家;周俊是旅行家、散文家;朱力远是小说家;向阳是剧作家。我的长项在哪里呢?与他们相比,我小说、散文不敢拿出手,再说我即使有这方面才能,凭着自知之明,也顶多算个三流的,但如果把精力花在新闻上,做一个职业新闻人,我有可能做到一流。

也是基于这样的想法,在 2006 年里,我开始以职业新闻记者来要

求自己。这一年我发稿达61篇,有《濮存昕:跳进“人艺”这锅粥》、《复旦自主招生》、《郭敬明抄袭案》、《卡拉OK版权收费》、《作协专题》等文化热点新闻,也有《出得了电影局,进不了电影院》、《长沙歌厅走出来的电视艺人》、《北京儿艺体制改革轨迹》、《洛丽塔从禁书到“世纪经典”》、《韩寒白烨之争》这样的文化现象观察和专题,有范小青、胡戈、阎连科、莫言、余华、陈忠实、武和平、胡因梦、谭恩美这样的深入专访,也有《追寻那支西去的红军》这样的研究性题目。我拿了5个月度好稿奖、2个总编特别奖、1个年度新闻二等奖。

《南方周末》是一所好学校,这里有一支高水准的编辑队伍,和他们合作,锻炼了我的业务能力。从一个采访的准备功课、提纲的设置,到现场的采访技巧,还有后期的写作,我都获益匪浅。比如,通过和文化部的向阳、吴蔚、陈一鸣的合作,学到怎么写新闻;从新闻部的张捷和后来加入《南方周末》的袁蕾那里,学到了新闻的整体结构。我深深地感受到,在别的报纸干,我交出去的是原材料;在《南方周末》,我交出去的是作品。

到了2007年的时候,我的发稿量达到了66篇。盘点一下,我保持了原来的传统,比如有郭敬明的官司案、新闻发言人、作协扩招专题,王卫平谈中国电视意识形态方面的专访,也有4个版的《大明王朝》专题,更有对老南京遭受破坏、文化部推行上岗证谋利的调查,还有《海艺辱师门全记录》这样的特稿尝试,也有关于慰安妇赔偿调查、上海教科书停用重编的深度调查;还有我打破部门壁垒,为新闻部民生版的选题贡献,比如《公民韩寒的交通问题》等,为此,我还获得了5个月度新闻奖、2个总编奖、《南方周末》的年度十佳员工奖和年度新闻三等奖、教育部新闻专题奖。

在2008年,我在职业记者的道路上继续前行,发稿量高达97篇,获得了6个月度新闻奖、1个总编奖,《张艺谋解密开幕式》获得《南方周末》的年度新闻二等奖,《中国制造李连杰》和《“就是一个体制问题”——吴冠中谈中国美术现状》获得年度新闻提名奖。

2009年,我发稿91篇,获得4个月度新闻奖,2个集体月度新闻奖。

我参与了中国梦，开拓周末图书出版项目。我获得《南方周末》优秀员工特别贡献金奖。这一年，我在访谈领域有明显的进步，比如关于许倬云、戈贝尔、刘小萌、奈斯比特、金冲及的访谈；在热点人物上，我也没有放过，比如葛优、库恩、季羨林、张艺谋、莫言基本上都是独家专访；在热点事件上，我对社会热点名人做广告立法解读专题，张爱玲小团圆专题，文化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专题、香港电影北上专题、知青专题、世界音乐专题、《新闻联播》改版专题基本上都是厚实呈现。

有时候，和新闻部或者和经济部的同事聊起来，听到他们认为文化部的采访容易、写稿容易，我就觉得是一种误读：社会新闻和经济新闻，很多时候是凭着惯性在工作，因为它往往是在事件发生以后才开始，你只要顺着事件的逻辑，把真相和前因后果查清楚，写出来就好。不管采访多少人，你是一个简单的采访，甚至是三言两语的采访。

而文化部做的新闻呢？通常是公众知道的人物，每一次采访都要有新料出来；通常一个热点有几百家媒体采访，可见有多难。为一个人物，采访两小时，资料收集和采访提纲可能是两到三天的准备，加上采访、写作，可能是一周。时政、社会、经济新闻的竞争对手有那么多吗？

2010年开始，是我在《南方周末》工作的第八个年头，受报社委托，我负责图书出版方面的开拓工作。可能我不会像以往7年里那样写那么多稿子，但对于我以后的每一篇新闻报道，我将一如既往地努力，写出代表《南方周末》高水准的稿子来。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像已有的《南方周末》记者那样，能够把名字铭刻在中国新闻史上。

虽然我已经38岁了，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成熟的记者，我的路才刚刚开始，我希望能够永远保持激情和动力，保持一个人在路上奋力奔跑的姿势，就像《南方周末》的那几句广告语：你见到我的时候，我和新闻在纸上，你见不到我的时候，我和新闻在路上。

总序：你必须抚摸他们，他们是中国跳脱的心	陈明洋 1
序：在路上	5

第 壹 辑 新闻现场

为什么要骂张艺谋	
——张艺谋批评史	2
余秋雨“文革”调查	18
吴冠中假画调查	30
谢晋的最后时刻	42
海艺“辱师门”调查	56

第 贰 辑 体制与人

濮存昕：跳进“人艺”这锅粥	64
张和平：“人艺”温和的变革者	73
到处都有张和平	83
“就是一个体制问题”	
——吴冠中谈中国美术现状	92
陈道明：“我原来就不是往人群里走的人”	100
演员陈道明	115

第 ③ 辑 文化真相

金庸：学问不够是人生一大缺憾	126
吴宇森：我拍电影是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	137
“文革”都成历史了，还要让人沉重多久啊 ——专访张艺谋	146
中国制造李连杰	167
“就是希望政府知道这个事儿” ——李连杰的“术”和“道”	180
冯小刚：《唐山大地震》拍摄揭秘	191
葛优：我现在就想娱乐大众	204
王志文：所有的戏都是在演我自己	224

代后记

张英：南瓜泡沫第一猛人	傅剑锋 257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第

辑

新闻现场

为什么要骂张艺谋

——张艺谋批评史

我们制作一份清单，张艺谋批评史。目的不是清算张艺谋，亦不是清算批评张艺谋的人。不是为了留恋过去，甚至不是为了关切今天，而是为了期望将来。

期望我们有更多样的创作，有更多种的声音，亦有更多的平和；期望我们终究不免时代的烙印，却能够不受时代的绑架。

期望一部电影只是一部电影，一个张艺谋只是一个张艺谋，不要一种声音长期占据公共空间，亦不要一个张艺谋总是沦为中心话题。这一层家常的意思，说给我们的电影业者、观者、批评者、管理者，和我们的媒体同业。

2009年2月，张艺谋在北京参加2008 CCTV体坛风云人物颁奖礼，他获得体坛风云人物评委会大奖，作为北京奥运会、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，张艺谋两次登台领奖，他已经被看成北京奥运会的代言人

在李劫看来，张艺谋拍大片是无奈，也是必然：“《活着》的遭禁使张艺谋面临如何活着的问题，最后张艺谋选择了谢晋的团团作揖，为了他的电影事业能够继续活着。”

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公开表示不喜欢《一个都不能少》，认为这部电影是在“替政府做宣传”，张艺谋在媒体上发表《给雅各布的一封信》，高调退出戛纳，这是张艺谋和原来知识分子彻底决裂的转折点。片尾张艺谋给代课教师和她寻找的孩子们加上了光明的未来。

谢晋走了，张艺谋来了

“张艺谋的沦落，终究是电影制度的问题。一个问题成堆的电影体制，把好好端端的张艺谋变成了一个文化怪物。这个富于才华的导演，最终辜负了我们25年前对他的热烈期待。”文艺批评家朱大可告诉《南方周末》记者。

当年对张艺谋的捧，是从对谢晋的贬开始的。

据朱大可回忆，最早批评谢晋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李劫，在上海的沪西工人文化宫影评组主办的一个电影讲座上，首次提出“谢晋电影时代应该结束”，赢得在场影评员的热烈掌声。

1986年7月8日，朱大可在《文汇报》上发表了《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》，这些缺陷包括“谢晋电影的商业性质”，以及“标准的好莱坞审美眼光和习惯”，“更令人不安的是谢晋一味迎合的道德趣味，与所谓现代意识毫无干系”。

文章被大量转载，引发了关于谢晋电影的大讨论。

李劫发表了《谢晋时代应该结束》的文章。认为谢晋这位颇有才气的导演，在银幕上向四周“团团作揖”，以换取一片“热烈而盲目”的喝彩声和掌声。

对张艺谋电影的挖掘，是在这场批评后不久发生的。“大概是1987年，《红高粱》到上海首映时，《文汇报》的文艺部主任给了我一张票，叫我务必看一看。我去看了之后，觉得有些新意，在随后由《文汇报》举行的讨论会上说了这意思。”李劫说，出席那个讨论会的，都是当时所谓的先锋人物，比如张献、孙甘露、格非等。“《红高粱》在上海文艺评论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，甚至有人当场表示，这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个盛大节日。《红高粱》向世人表明了，中国电影不再按照权力意志炮制，而是随着创作者自己的意愿编导。”李劫说，对谢晋的批评给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登场，扫清了道路。

几个月后，《孩子王》上海首映式上，陈凯歌高兴地对朱大可说：“你的刀捅到了中国电影的肺叶子上了。”“对《红高粱》的肯定，确实是希望中国电影有所改观，突破谢晋模式。”李劫没想到的是，“张艺谋后来会变成谢晋第二，并且比谢晋还要谢晋”。

朱元璋式的传奇

张艺谋是用来推翻“谢晋模式”的“武器”，但张艺谋从来就不是这其中一员。

张艺谋一出生，父亲头上就顶着“历史反革命”的帽子，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他，从小心理和性格就很压抑、扭曲。

1978年9月，超龄6岁的工人张艺谋几经周折，破格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。由于当年学院招生过多，开学不到一个星期，就有人贴出大字报，针对学院扩大招生名额和破格录取学生的事，表达了“不同的意见”。

已经入学的张艺谋经历了退学、再入学，两进两出才艰难完成了4年的学业，这不是他的同班同学陈凯歌、田壮壮等人所能体会的。

“张艺谋登上电影行业的历史舞台，是一个刘邦式的故事，一个朱元璋式的传奇。”李劫总结说。

1988年2月23日，《红高粱》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，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西方A级电影节中获得大奖，消息传回中国，被认为是“为国争光”，当时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还举行了庆功宴。

然而，仅仅三个月后，风向就开始变了。1988年5月起，以《中国电影报》为大本营，发表了一系列对《红高粱》的批评文章。

5月5日，《中国电影报》将这部作品称为“丑化、糟蹋、侮辱中国人的影片”。10日，该报再次刊文《干涸的心田》，将批评的调子升为“辱华”。

此后，《文汇报》同时刊登了批评和肯定《红高粱》的文章，作家白桦是支持者之一：“‘红’片表现了旧时代的民俗、民风以及私生活等，我并不觉得这是迎合洋人的口味，传统性很强，恰恰接近过去的生活真实。”

当年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陈昊苏在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撰文说：“如果一部影片在国外获了奖，我们反而太敏感，很警惕，总认为外国人搞了什么鬼，以至于原来自己认为是好作品也不敢再说好了，这难道是有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吗？”

“谨小慎微”的张艺谋对批评尤其敏感：“《红高粱》在筹拍阶段，有人指责‘张艺谋在《一个和八个》里就歌颂土匪抗日’，等到《红高粱》上映，又有人指责‘《红高粱》里的人物活得浑浑噩噩，缺乏崇高感’。”